

“一边倒”与美国“机会丧失论”再探讨(1949—1950)*

周天羽

〔摘要〕“机会丧失论”是指学界关于1949年前后美国与中共曾有和解机会但最终失去的观点。最近解密的档案明确显示,1949年6月毛泽东公开宣布“一边倒”之前,中美接触并不“秘密”,而是多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周密安排下进行;而毛泽东宣布“一边倒”之后,美国仍试图放弃台湾来阻止中苏结盟,但中共为了国家安全与国内政权稳定,决定先与苏联重订新约并结盟。事实上,当时中共的地缘政治环境决定中共无法与美国和解,美国根本没有所谓失去的“机会”。

〔关键词〕“一边倒”;“机会丧失论”;中美关系;中苏同盟

〔中图分类号〕K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22)10-0067-09

一 前 言

新中国建立前后,一些美国人认为美国有可能借经贸合作与中共和解^①。但是随着中苏同盟建立和朝鲜战争爆发,中美长期敌对,而50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的盛行更让所谓美国有与中共和解机会的说法销声匿迹。不过,60年代中苏关系的恶化、美国反越战运动引发的左翼修正主义风潮和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破冰等事件促使美国学界提出,早在40年代末,美国与中共就存在和解或至少不直接对立的机会^②。这成为“机会丧失论”的开端。70年代中后期,1949—1950年美国外交有关档案的陆续公布,进一步加强了此观点^③。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学界普遍认为美国曾有过与中共和解的机会^④。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有关档案和其他文献逐渐公开^⑤。此后,中国学者开始就此议题进行讨

* 基金项目:韩国教育部韩国学研究“重点大学”计划——“关于近现代中韩关系世界高水平研究教育体系的构建”(AKS-2021-OLU-2250005)。

① 以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为代表的部分美国人曾建议“与中共建立全面经贸合作关系”,但该方案被国务卿艾奇逊否决。艾奇逊最终接受了国务院远东事务局的建议,在中国推行“铁托主义”[参见卿思美:《从盟友到敌人:现代性、身份认同和美中外交政策的视角(1945—1960)》(Qing Simei, *From Allies to Enemies: Visions of Modernity, Identity, and U.S.-China Diplomacy, 1945—1960*),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7~99页]。

② 梅尔文·格托夫:《美国反对第三世界:反民族主义和干涉主义》(Melvin Gurtov, *The United States against the Third World: Antinationalism and Intervention*),纽约:普雷格出版公司1974年版,第142页;周锡瑞编:《在中国丧失机会:二战时期谢伟思书信集》(Joseph W. Esherick, ed., *Lost Chance in China: The World War II Di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纽约:兰登书屋佳酿出版公司1974年版。

③ 材料方面,1974年、1976年和1978年,美国分别公布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的 China Volume IX, 1949; China Volume VI, 1950 和 China Volume VIII, 1949。特别是1978年公布的档案,包含司徒—黄华会面、“周恩来声明”等多份中美秘密接触文件。

④ 韩德:“毛泽东和与美国和解问题,1948—1950”(Michael H. Hunt, “Mao Tse-tung and the Issue of Accommod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1948—1950”),第207~209、230~233页;戈迪温:“中共对美政策:机会和遏制,1944—1950”(Steven M. Goldste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1944—1950”),第274~278页,多萝西·博格、沃尔多·海因里希斯编:《未定之秋:中美关系(1947—1950)》(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s, eds., *Uncertain Years: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47—1950*),《1978年七泉中心中美关系研讨会论文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⑤ 中国20世纪80年代先后出版《毛泽东军事文选》(1981年)和《周恩来年谱》(1989年)等,90年代《毛泽东外交文选》(1994年)和《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1998年)等也陆续出版。

论。部分学者以中共革命为中心,认为中共只能对苏“一边倒”^①。还有部分学者以美国为中心,有的认为当时美国对华政策尚未确定,还有的认为美国对中共全方位敌视,因此中美毫无和解可能^②。不过,这些学者大都采取中国中心观或美国中心观,前者对中美苏关系的判断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后者则简单将中美和解的最终决定权归于美国。

中国档案的公开和美国学者对当事人的采访,也推动了美国学界转而认为并不存在中美和解的机会。1997年,五位学者在《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上集中讨论该议题,并主要根据中苏意识形态的相似性,认为中美不存在和解机会^③。之后,此观点成为中美学术界的定论^④。

但目前,学界对“中美不存在和解机会”的结论缺少充分论证。具体而言,有些研究难以摆脱意识形态限制,存在过分的中国或美国中心观,而且这些研究的主要史料基础是对周恩来助手等当事人的采访,而非1949年中共最高层的意见,因此史料价值有待商榷。而对关键史料的梳理,尤其是对毛泽东、斯大林在中美接触中往来电文等档案的分析,至今仍不够充分,值得进一步讨论。

有鉴于此,本文主要依据全新的苏联档案并重新梳理中美档案,希望还原新中国建立前后中美苏三角关系。一方面,分析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中美接触中的商议过程,来理解苏联对中共决策的实际影响;另一方面,梳理1948—1950年的中苏分歧,展现中苏既密切又暗含嫌隙的复杂关系。本文认为,考虑到国内外政治环境,对苏“一边倒”是中共的唯一选择。而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也决定,美国同样不可能与中共和解。

二 “一边倒”之前:中共与美国的“秘密”接触和苏联的幕后筹谋

国共内战爆发后,国民党一度占据优势并获美国长期支持。但从1947年下半年起,内战形势开始倒向中共,美国因而相应调整其对华政策,考虑将对华的主要交涉对象由国民党转向共产党。1948年7—8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mmittee, NSC)和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 JCS)已经认识到国民党政府必然破产,并认为继续为其提供军事援助,仅能暂时推迟中共掌握全中国的时间^⑤。10月,美国政府明确未来对华政策的三原则:“一、继续承认现有国民政府;二、国民政府失败后,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承认(中共);三、尽可能防止中国成为苏联政治一军事力量的附庸。”^⑥

-
- ① 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3~288页;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第116页。
- ②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258页;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1949—1950)》,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页。
- ③ 孔华润:“引言:在中国曾有‘失去的机会’吗?”(Warren I. Cohen, “Introduction: Was There a ‘Lost Chance’ in China?”)、陈兼:“美国在中国‘丧失机会’的神话:借助新材料的中国视角”(Chen Jian, “The Myth of America’s ‘Lost Chance’ in China: A Chinese Perspective in light of New Evidence”)、高龙江:“没有机会:革命和意识形态”(John W. Garver, “Little Chance: Revolutions and Ideologies”)、盛慕真:“国际主义的胜利:1949年前的中共—苏联关系”(Michael Sheng, “The Triumph of Internationalism: CCP-Moscow Relations before 1949”)、文安立:“代价、机会和神话:美国和中苏同盟的建立,1945—1950”(Odd Arne Westad, “Losses, Chances, and Myth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50”),《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第21卷第1期(1997年1月),第71~75、77~86、87~94、95~104、105~115页。
- ④ 迪特·海茵茨希:《苏联和共产主义中国,1945—1950:走向同盟的艰难之路》(Dieter Heinzig, *The Soviet Union and Communist China, 1945—1950: The Arduous Road to the Alliance*),纽约:M.E.夏普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255页;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政策——以艾奇逊和“承认问题”为中心的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90~191页;徐友珍:《分歧与协议:美英关系中的承认新中国问题(1949—1951年)》,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7~89页。
- ⑤ “美国对中国严峻形势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Possible Courses of Action for the U.S. with respect to the Critical Situation in China”)(1948年7月26日),《美国数字国家安全档案:国家安全委员会22号文件》(*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NSC 22*), <https://congressional.proquest.com/histvault? q = 002944-001-0673&accountid = 13151>, [发布日期不详]/2018-10-01;“美国对中国严峻形势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Possible Courses of Action for the U.S. with respect to the Critical Situation in China”)(1948年8月6日),《美国数字国家安全档案:国家安全委员会22/1号文件》, <https://congressional.proquest.com/histvault? q = 002944-001-0683&accountid = 13151>, [发布日期不详]/2018-10-01。
- ⑥ “美国对华政策”(“U.S. Policy toward China”)(1948年10月13日),《美国数字国家安全档案:国家安全委员会34号文件》, <https://congressional.proquest.com/histvault? q = 002948-001-0014&accountid = 13151>, [发布日期不详]/2018-10-01。

到1949年1月,淮海和平津战役结束,中共解放北平、天津等主要城市,内战走向愈发明确。2月4日,美国认为对华援助是军事和政治上的浪费,因此决定暂停提供对华军事援助计划中的剩余船只^①。2月底,考虑到1949年初中苏在国共和谈与中共渡江问题上曾发生严重分歧^②,美国曾短暂考虑是否承认中共,但政府主流观点仍是借助政治、经济上的“楔子战略”,利用中共与苏联之间的任何“裂缝”,使毛泽东成为“第二个铁托”^③。

4月23日,中共成功渡江并解放南京。美国国务院很快决定了承认中共的三大前提:“一、中共能够控制所有领土、正常行使国家职权并维持社会秩序;二、能够并愿意履行国际义务;三、获得人民的承认。”^④其中,美国最重视中共能否继承国民政府签订的旧约。

到5月,美国为了试探中共对美政策,派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中共南京外交代表黄华接触。13日双方首次会谈后,司徒雷登在发回国务院的电报中称,黄华展现出“对于中美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实现外交承认的极大兴趣”,同时声称“中国需要和外国之间的商业和其他关系”^⑤。尽管美方可能误解黄华的表达,但至少中共给美国留下的印象是不排斥与美国交往。

6月初,美国驻北平领事柯乐博(Edmund Clubb)又得到一个情报,后来被称为“周恩来声明”(Chou En-lai Démarche)。声明中,“周恩来”强调,“中国需要的经济援助苏联无法提供,只有美英可以……因此希望与美国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同时,“周恩来”指出,“中共领导层有两个敌对集团,即以刘少奇为首的亲苏集团和以周恩来为首的亲美集团”^⑥。尽管周恩来助手们此后对该声明一致否认^⑦,但当时美国驻华外交官们却几乎一致相信这是周和刘“内斗”的结果^⑧。他们的态度,很可能与同时进行的司徒和黄华会谈有关。6月8日,黄华与司徒助手傅泾波见面时也强调,“苏联无法给予足够帮助,此时中共尤其需要美国的帮助”。同时,中共“希望尽快(同美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⑨。可以说,几乎一致的内容促使美国认定,中共急需美国的承认和帮助。

但是,毛泽东和中共的真实态度是什么呢?早在1949年4月,周恩来就提出派黄华前往南京外事处工作并以燕京大学校友的私人身份与司徒雷登接触,“特别注意了解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态度”^⑩。可见,中共当时也希望同美国接触。首次会谈前,毛泽东更是亲自指导黄华谈判细节并特意指出,“如果司徒雷登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采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⑪。尽管中共此时保持观望和友善,但并不能说明中共有意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事实上,中共1949年一贯的

① “美国关于对华援助的现有立场”(“The Current Position of the U.S. respecting Delivery of Aid to China”)(1949年2月4日),《美国数字国家安全档案: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3次会议》,https://congressional.proquest.com/histvault? q=002957-001-0156&.accountid=13151,[发布日期不详]/2018-10-1。

② 金东吉:《关于斯大林是否劝阻中共渡江问题再分析》,《党的文献》2006年第4期,第72页。

③ “美国对华政策,国务院”(“U.S.Policy toward China,Secretary of State”)(1949年2月28日),《美国数字国家安全档案:国家安全委员会34/2号文件》,https://congressional.proquest.com/histvault? q=002948-001-0051&.accountid=13151,[发布日期不详]/2018-10-01。

④ “国务卿致驻华大使司徒雷登”[“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1949年5月13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第9卷,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74年版,第22页。

⑤ “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致国务卿”[“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1949年5月14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第8卷,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78年版,第746页。

⑥ “驻北平领事柯乐博致国务卿”[“The Consul General at Peiping (Clubb)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1949年6月1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第8卷,第358页。

⑦ 孔华润:“与中国朋友们的交流:周恩来助手回忆40年代和朝鲜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Warren I.Cohen,“Conversations with Chinese Friends;Zhou Enlai’s Associates Reflect o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1940s and the Korean War”),《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第11卷第3期(1987年7月),第287页。

⑧ “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致国务卿”[“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1949年6月7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第8卷,第372页。

⑨ “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致国务卿”[“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1949年6月9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第8卷,第377~378页。

⑩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79页。

⑪ 《黄华同司徒雷登谈话应注意的几个问题》(1949年5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87~88页。

对外方针都是暂缓与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1949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不必忙于去解决(外交问题)”,并坚持“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①。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②可见,当时中共的外交原则始终是暂缓解决承认问题和坚持废除不平等旧约。考虑到美国承认中共的前提是“中共继承旧约”,其实双方并没有谈判余地。那么,为何中共与美国还进行了接触?毛泽东指出,中共目标是“侦察美国政府的意向”^③。有学者据此认为这是中美双方的战略试探,还有学者认为中共借“承认问题”故意迷惑美国以防止其介入中国内战^④。

尽管中方实际目的有待核心档案进一步公开后确认,但根据苏联档案来看,苏联其实在中美接触过程中全程参与。1949年4月13日,毛泽东曾通报斯大林,“美国政府通过代理人(花旗银行)想给我们提供1—3亿美元的贷款”,并表示中共有意与资本主义国家保持经济联系,但“这还不是最后的决定”^⑤。随后,斯大林建议中国“在一定条件下不必拒绝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建立正式的关系……(也)不宜拒绝外国贷款及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活动”^⑥。尽管中苏更多是互相试探,但这也说明,中共在决策前就会与斯大林沟通中美接触细节并寻求其关于中共对美政策的建议。

此外,中苏也对司徒—黄华会谈细节保持不同层级的交流。外交官层面上,黄华在与美方会谈后,很可能向苏联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留守南京大使馆的外交官列多夫斯基告知会谈的大概情况^⑦。而斯大林、毛泽东的往来密电也显示,中共中央会将许多中美接触细节迅速发往莫斯科。比如5月23日,毛泽东通过斯大林特使科瓦廖夫向斯大林具体汇报了中美会谈涉及的美军撤军和中国建立联合政府等问题^⑧。可见,美国自以为“秘密”的接触并不秘密,斯大林一直掌握会谈内容,因此美国无法推动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

但是中苏并非毫无嫌隙。1948年起,中共—苏联关系由于南斯拉夫问题出现很大不稳定性——苏联怀疑毛泽东有“铁托主义”倾向,而中共则不断争取斯大林的信任。1948年6月苏联把南斯拉夫赶出共产党情报局后,11月1日,刘少奇专门撰文批判铁托并称中共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支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⑨。1949年初米高扬访问期间,毛泽东也表态支持对铁托的处理^⑩。但直到9

① 《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5页。

②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第167页。

③ 《黄华同司徒雷登谈话应注意的几个问题》(1949年5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87页。

④ 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第283页;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第113页;卿思美:《从盟友到敌人:现代性、身份认同和美中外交政策的视角(1945—1960)》,第149~150页。

⑤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与毛泽东谈中国局势》(1949年4月13日),沈志华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9.3—1950.7)(二),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38~39页。

⑥ 《斯大林致科瓦廖夫电:中国民主政府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1949年4月19日),沈志华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9.3—1950.7)(二),第41页。

⑦ 列多夫斯基:《中国政治、美国与苏联外交1942—1954》(A.M.Ледовский, Китай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США и совет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1942—1954),莫斯科:“科学”出版社东方文献编委会1985年版,第181~183页;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81页。

⑧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毛泽东谈战事和中美接触情况》(1949年5月23日),沈志华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9.3—1950.7)(二),第56页。

⑨ 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1948年11月1日),《人民日报》,1948年11月7日,第1版。

⑩ 《米高扬与毛泽东等人会谈纪要:中共历史问题》(1949年2月3日),沈志华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一),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410页。

月15日,苏联仍担心美国“把中共推上铁托式的民族主义道路”^①。可见,就算中共宣布“一边倒”,苏联也未能消弭对中共的猜忌。因此,中共把与美国接触的内容详细通报苏联,也可能是为了争取苏联的信任。此外,既往研究已经证明,1949年1月斯大林曾希望调停国共并促成联合政府,这一度造成了中共与苏共关系紧张^②。为缓和关系,米高扬于1月底秘密访问西柏坡并与中共高层直接会谈。此后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与苏联结盟的倾向^③。而在刘少奇一行6月底抵达莫斯科后,30日毛泽东立即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宣布对苏“一边倒”^④。

可见,毛泽东公开宣布“一边倒”之前,中美的“秘密”接触和中共的“善意”,基本都有中共征询苏联意见的过程,这足以证明毛泽东不是“亚洲的铁托”,美国也没有所谓“机会”。毛泽东宣布“一边倒”之后,中苏关系进入了全新阶段。

三 “一边倒”之后:中苏同盟的建立与美国阻止中苏结盟企图的失败

以往认为,1949年6月底毛泽东公开宣布“一边倒”后,美国与中共和解机会彻底消失^⑤。但8月15日艾奇逊对《白皮书》的解释,证明美国仍保留一定的政策弹性,即美国不打算立刻承认中共,但也力图使中共不沦为苏联“附庸”,即中苏不能结盟^⑥。为了阻止中苏结盟,美国甚至不惜失去台湾。

1949年初,美国高层短暂认为,保护台湾除了经济和外交途径,也需要军事手段^⑦。但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放弃了这个的想法。10月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台湾对美国军事价值不高,但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对其他离岸地区的控制,比如菲律宾、琉球和日本”。因此,尽管美国“应当尽力避免中共控制台湾”,但“不会为了保护台湾动用武力”^⑧。11月初,杜鲁门批准并转达蒋介石^⑨。12月初,美国国务院认为,台湾未来或被中共占领,或被移交中共。对这种“令人不快的结果”,美国只能接受。同时,美国驻菲律宾、泰国和新西兰等地外交官再次向驻地政府转达8月《白皮书》的观点——失去台湾是国民政府的责任,不是美国的失败^⑩。可见,1949年年底美国对台方针基本定型。

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并与斯大林开始同盟谈判。很快,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分别发布官方声明,向美国公众,更是向中共明确美国对台湾地位的界定,希望借此阻止中苏结盟。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公开声称会遵从《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将台湾归还中国。他还指出,美国在台没有领土、特权或军事基地需求,也不打算用武力改变现状或参与中国内战。当日下午,艾

① 《列多夫斯基致费德林报告:关于美国对华政策问题》(1949年9月15日),沈志华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9.3—1950.7)(二),第109页。

② 金东吉:《关于斯大林是否劝阻中共渡江问题再分析》,第72页;牛军:《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148页。

③ 牛军:《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第152页。

④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人民日报》,1949年7月1日,第1版。

⑤ 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第117~118页;牛军:《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第184~185页。

⑥ 艾奇逊:“美国对远东政策的基本原则”(“Basic Principles of U.S. Policy toward the Far East”)(1949年8月15日),美国国务院:《国务院公报》(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第21号,第236页。

⑦ “美国关于台湾的现有立场”(“The Current Position of the U.S. with respect to Formosa”)(1949年2月3日),《美国数字国家安全档案: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3次会议》,https://congressional.proquest.com/histvault? q = 002961-001-0104&accountid=13151,[发布日期不详]/2018-10-01。

⑧ “美国关于台湾的立场”(“The Position of the U.S. with respect to Formosa”)(1949年10月6日),《美国数字国家安全档案:国家安全委员会37/8号文件》,https://congressional.proquest.com/histvault? q = 002944-001-0935&accountid=13151,[发布日期不详]/2018-10-01。

⑨ 中国事务局局长斯普劳斯:“会议备忘录”[“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Sprouse)”](1949年12月6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第9卷,第437页。

⑩ “远东事务局副局长摩尔坎特致远东事务局助理国务卿巴特沃思的会议备忘录”[“Memorandum by the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Merchant) 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Butterworth)”](1949年12月1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第9卷,第432页。

奇逊向媒体进一步解释上述声明^①。

但是,中共没有对美国的争取信号做出其所希望的回应。相反,可能出于对美国表态能否兑现的不信任和促成中苏结盟的需要,1月6日,北京军管会发布《收回外国兵营地产》文告,命令美、法、荷领馆限14日交出兵营地产^②。这涉及维护新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对此,美国表示反对,一方面警告将关闭在华所有公署并撤回外交官,另一方面派驻北平领事柯乐博于7—13日间多次向周恩来、聂荣臻递交有关北京军管会此举后果的书信。尽管这些信函看起来“曾被打开和阅读”,但始终“没有获得(中共的)回复或复函”^③。可以说,中共了解征用外国兵营的结果,但依然坚持如此。至于原因,很可能是在此期间,斯大林终于松口,同意周恩来前往苏联讨论重新签订中苏条约事宜。为了促成谈判,中共只能对美国激进回应。

尽管如此,美国还是为阻止中苏结盟做出最后尝试。1月12日,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先列举苏联侵犯中国主权的证据,再重申美国在台没有军事和战略需求,最终强调台湾不在美国太平洋地区的“战略防御圈”(Defensive Perimeter)中,即明确美国不会军事介入台湾^④。但是,这也是徒劳的。13日晚,毛泽东在同一封电报中同意了北京军管会征用外国兵营地产和华东局早在1月3日提出的、由上海军管会直接征收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留沪物资的两个计划^⑤。毛、刘曾分别解释中共这种回应的原因。13日,毛表示,此举可以“赢得时间,对国内秩序进行应有的整顿……(这)将会使中国人民的政治情绪高涨,将有利于继续孤立中国有亲美情绪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⑥。16日,刘少奇也指出是为了“再把美国刺激一下”^⑦。相反,如果中共轻易相信美国的所谓承诺,那么不仅国内资产阶级右翼分子亲美情绪更盛,而且中共很有可能失去自身革命成果的独立性。此外,中共此举更是为了安抚苏联:就算美国表示放弃台湾,中共还是优先与苏联签订新约和结盟。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抵苏并在车站发表公开演说^⑧。次日,苏联《真理报》头版头条报道^⑨。美国舆论认为中苏谈判进入关键阶段,“苏联即将获得亚洲的全面胜利”^⑩。1月底,中苏达成协议草案。31日,杜鲁门要求国务院和国防部“重新考虑美国的战争与和平目标”^⑪。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订,美国“楔子战略”完全破产。有学者认为,中苏结盟直接导致了冷战标志性文件NSC 68的出台^⑫。

- ① “美国对台政策”(“U.S. Policy toward Formosa”)(1950年1月5日),美国国务院:《国务院公报》(*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第22号,1950年1月5日,第79~81页。
- ② 《关于美国对我征用外国兵营文告的反应给毛泽东的电报》(1950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22页。
- ③ “共产党人没收美国在华财产”(“Communists Take U.S. Property in China”)(1950年1月14日),美国国务院:《国务院公报》第22号,第121~123页。
- ④ 艾奇逊:“亚洲危机——对美国政策的考验”(“Crisis in Asia—An Examination of U.S. Policy”)(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院:《国务院公报》第22号,第116页。
-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8页。
- ⑥ 《维辛斯基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1950年1月13日),沈志华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9.3—1950.7)(二),第232页。
- ⑦ 《关于处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留沪物资问题的电报和批语》(1950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331页。
- 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 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和外交部长周恩来抵达莫斯科”(“Прибытие в Москву Премьер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го Совета и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Чжоу Энь-ляя”);“周恩来演讲”(“Речь г. Чжоу Энь-ляя”),《真理报》(*ПРАВДА*),1950年1月21日,第1版。
- ⑩ 1950年“莫斯科即将获得亚洲的全面胜利”(“Full Asia Victory Is Seen in Moscow”),《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50年1月22日,第1版。24—25日,美国驻苏大使柯克(Alan Kirk)的电报,均将苏联公开报道视为意图推动世界革命的证据。“驻苏大使柯克致国务卿”[“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 (Kirk)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1950年1月24日、25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第9卷,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80年版,第1084~1088页。
- ⑪ “总统致国务卿”(“The Presiden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1950年1月31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第1卷,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77年版,第141~142页。
- ⑫ 王缉思:《1945—1955年美国对华政策及其后果》,袁明、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44页;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页。

除了美国,中苏谈判期间苏联对华政策也发生了变化。1949年12月16日斯大林与毛泽东第一次会谈时,斯大林希望实际保留中苏旧约^①。不过,可能考虑到中共重订新约的强烈要求与国外报纸上“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等传闻,1950年1月2日苏联首次同意谈判新约^②。在随后草案中,苏联要求在签订对日和约后再讨论旅顺撤军和大连问题,同时坚持保留中长铁路的苏方管理权优势。但26日中方修正案态度突变,要求苏联在签订对日条约之后立刻无偿归还中长铁路^③。吊诡的是,28日苏方让步并几乎完全采纳中方草案,尤其是对中长铁路的处理^④。不过,之后苏方要求签订“补充协定”,在苏联的远东和中亚地区、中国的东北和新疆,“不给予外人以租让权利,并不准第三国资本或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所参加之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社会与团体的活动”^⑤。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表示,这是斯大林“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⑥。苏联的“补充协定”很可能是对中方要求收回中长铁路的反制,体现了斯大林对中共的强烈不满。

此时苏联对中共既退让又不满的态度,可能与中共外交形势利好和苏联担心美国承认中共等因素有关。1950年1月,英国、印度、缅甸等国接连承认中共。有利的国际环境,既促使中方有底气提出更多要求,也让苏联为拉拢中共做出更大让步。毛泽东后来也指出:“斯大林的立场发生变化,也许是印度人和英国人帮了我们的忙。”^⑦此外,1月17日苏联的情报也提到,美国正借英国承认中共,试探自己能否承认^⑧。上述因素均有可能导致苏联在谈判中不得已退让。

但苏联显然不甘于单方面让步,因此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失之东隅,收之桑榆”。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首次以新中国外交部长身份向联合国要求取消国民政府的联合国代表权^⑨。随后,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和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多次声援^⑩。在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和艾奇逊的公开发言后,6日维辛斯基立刻与毛泽东会面,希望中国发声明否认国民党代表的合法性,并称苏联将拒绝出席安理会以示支持^⑪。8日,周恩来发表声明^⑫。10日,马立克公开声称,如果安理会不驱逐国民党代表,苏联将不参加安理会^⑬。此后,马立克两次提前离席以示强硬态度。虽然中国以往研究大

-
- ①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中苏条约和台湾问题》(1949年12月16日),沈志华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9.3—1950.7)(二),第175~178页。
- ② 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38~439页。
- ③ 《中方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的草案》(1950年1月26日),沈志华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9.3—1950.7)(二),第279~280页。目前中方态度转变的原因缺少核心档案,有待进一步研究。
- ④ 《苏方对中方的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及议定书修改后的定稿》(1950年1月28日),沈志华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9.3—1950.7)(二),第281~283页。
- ⑤ 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735页。
- ⑥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3页。
- ⑦ 帕·尤金:《毛泽东谈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中国政策》,《远东问题》1994年第5期,第106页。转引自《1950年中苏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根据俄国解密的档案材料),沈志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页。
- ⑧ 《来自中国的秘密情报:美国挑拨中苏关系的计划》(1950年1月17日),沈志华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9.3—1950.7)(二),第248页。
- ⑨ 《关于取消原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联合国资格问题的电报》(194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37~538页。
- ⑩ 1949年11月23日和25日联大会议上维辛斯基曾声援中共,12月29日安理会会议上马立克也表态支持。《苏联支持周外长声明 维辛斯基在联大痛斥蒋匪廷献 否认国民党代表团为中国代表》(1949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7日,第1版;《美英破坏联合国尊严 联大政委会竟讨论国民党冒牌代表对苏诽谤性声明 苏波捷等国代表拒绝参加 将不受对此问题通过决定的任何约束 一致支持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庄严声明》(1949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9日,第1版;《马立克: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关于不承认蒋介石卖国集团在联合国的代表的声明》(1949年12月29日),世界知识社编:《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发言选集》第2集,北京:世界知识社1955年版,第546页。
- ⑪ 《关于就否认前国民党政府代表在安理会的合法地位发表外交部声明的电报》(1950年1月7日),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19页。
- ⑫ 《周恩来外长致四届联大主席罗慕洛及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电》(1950年1月8日),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上,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14页。
- ⑬ 《马立克:提出提案坚决主张将蒋介石卖国集团的代表从安全理事会驱逐出去》(1950年1月10日),世界知识社编:《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发言选集》第2集,第547页。

多认为苏联是为了帮助中共^①,但当时国际外交界人士却持不同观点。时任联合国秘书长赖伊(Trygve Lie)认为,苏联在阻碍中共进入联合国^②。时任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卡多根(Alexander Cadogan)也持类似观点。作为曾在国联长期任职的外交官,卡多根认为,苏联此举是为了促使中共被国际社会孤立以便控制^③。此外,赖伊也曾在会见斯大林、莫洛托夫时观察,发现他们仅将中国视为次要问题^④。那么,苏联为了不那么重要的中国退出联合国,本身值得怀疑。

此外,美国当时也并非完全反对中共获得联合国代表权。虽然1月13日投票时,美国反对苏联提出的“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代表蒋廷黻的全权证书并将其驱逐出联合国”提案,但根据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格罗斯(Ernest Gross)与蒋廷黻、赖伊的交谈记录,可以发现美国态度并不坚定。据蒋廷黻报告,格罗斯曾表示,“如有七票赞成中共加入,美将不愿提否决票”^⑤。同样的态度也体现于格罗斯与赖伊的交流中。对于美国的实际态度,苏联很可能知情,因此担心中共政权一旦加入安理会,即会获得美国承认。随后数周内,苏联决绝地从超过21个联合国组织中退出以向联合国施压^⑥。最终,中共政府未能回到联合国。

概言之,从新中国成立到中苏同盟正式建立前,美苏对中共的政策都有很大变化。美国公开表态放弃台湾,希望阻止中苏结盟,但最终失败;苏联则在有条件退让、结盟并签订新约之余,又借“补充协定”、退出安理会等手段反制中共。但对当时的中共而言,与苏联结盟才是第一要务。

四 余论:苏联是中共唯一的选择——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共的外交逻辑

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共对外方针虽然受意识形态影响,但作为新生政权,中共更需要优先考虑现实国家利益。

考虑到中共与苏联对承认新中国问题有约在先,所以与苏联修约和结盟,才是中共建政后首要的外交目标,如此才能保证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的安全^⑦。当时,包括蒙古、北朝鲜和北越在内的中国邻国大多属于苏联阵营。如果此时中共与美国和解,那新生政权将处于极危险的周边环境。同样,当时美国考虑到亚洲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韩国、泰国和南越等)的感受,短期内也无法承认中共。可以说,当时中美均不具备和解条件。

废除中苏不平等旧约并与苏联结盟,同样对中共稳定国内政权意义重大。毛泽东访苏前,中共的政治基础并不稳固^⑧。毛泽东也曾向斯大林提到,中国社会舆论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签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失去了意义”^⑨。如果这种没有意义的条约,毛泽东访苏都未能废除,那么毛泽东和中共的声誉势必受到极大损害。相反,如果成功废除旧约,中共在国内的政权也会更加稳固。正如苏共中央情报部后来的观察,“条约公布后,谣言不攻自破”^⑩。

此外,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共并不打算立刻获得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承认,而是希望将中苏同盟

① 李铁城:《联合国五十年》,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页;张贵洪等:《中国与联合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9页。

②③④⑥ 赖伊:《为了和平:在联合国的七年》(Trygve Lie, *In the Cause of Peace: Seven Years with the United Nations*),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54年版,第258、268~270、267、252~253页。

⑤ 尽管蒋廷黻坚持认为中国代表权问题是“实质问题”,但格罗斯将其视作“程序问题”。对于“实质问题”,“包括常任理事国在内之七理事国之可决票为之”;而“程序问题”,则仅需七个理事国同意。前者国民政府代表可以行使否决权,而后者则只需争取到七个理事国同意,即便国民政府代表投否决票也无济于事。《“外交部长”叶公超上呈“行政院长”阎锡山关于我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地位问题》(1950年1月14日);《“外交部长”叶公超上“行政院长”阎锡山呈二则》(1950年1月16日),《特交档案分类资料》(外交:对联合国外交),第19卷,编号54760、54761,《蒋中正总统档案》,“国史馆”藏。转引自王正华:《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中国代表权),台北:“国史馆”2001年版,第14~17页。

⑦ 关于承认新中国问题,苏方直接讨论何时及何种方式承认。1949年2月1日,米高扬在西柏坡与中共高层商定,苏联或立刻承认,或一年后与别国同时承认新中国。《米高扬与周恩来等人会谈纪要:关于中共的对外政策》(1949年2月1日),沈志华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一),第388页。1949年10月2日,苏联第一时间承认新中国。

⑧ 《关于周恩来去苏联参加谈判问题给中央的电报》(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11页。

⑨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

⑩ 《苏共中央情报部报告:中国民众对中苏条约的反应》(1950年3月20日),沈志华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9.3—1950.7)(二),第349页。

条约作为“政治资本”，方便未来向资本主义国家提出废约，最终实现平等外交。毛泽东曾指出：“（与苏联签订同盟条约）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①新中国外交三原则也强调“另起炉灶”，即先废除不平等旧约，再建立平等的全新外交关系。为此，毛泽东甚至提出新中国外交需要经历“非独立自主”的阶段——即“（中共）在个别情况下与他们（指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实际的联系，但法律上不履行外交关系的手续”^②。可见，中共当时的外交逻辑并非由意识形态主导，更多还是从现实出发，认为独立平等的外交关系需要逐步实现。

不过，除了现实主义色彩之外，意识形态对中共外交方针的影响还是不容忽视。在“反帝”语境下，中共突然与“美帝国主义”交好并不现实。相反，毛泽东多次称斯大林是中共的“大老板”“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导师”^③。对比中共对美苏的不同政治宣传语境，当时中共也难以同美国缓和。

总之，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公开宣布“一边倒”前，尽管中美曾有过接触，但实际上斯大林始终了解接触内容甚至背后提供指导；而毛泽东宣布“一边倒”后，对于美国宣称放弃台湾的表态，中共依然决定先与苏联重订新约并结盟。因为中共对苏“一边倒”，更多是出于现实利益，特别是国内外政权稳定和将来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需要，并非只是出于与苏联意识形态的一致。只有到20世纪70年代，苏联成为中国头号敌人，中美才有了交好可能。

收稿日期 2019-03-25

作者周天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韩半岛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100871。

“Leaning to One Side” and Further Discussions on the Theory of America’s “Lost Chance” in China, 1949—1950

Zhou Tianyu

Abstract: America’s “Lost Chance” in China refers to the academic argument that there was once a reconciliation opportun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round 1949, but this opportunity had eventually been lost. Recent declassified documents clarified that the contac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ere not secret before Mao Zedong publicly declared the “leaning to one side” policy in June 1949, and that the U.S. government still attempted to prevent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by abandoning Taiwan after Mao’s declaration. However, for the sake of national security as well as the stability of the new regime, the CPC preferred to renew the pact and alliance with the Soviet Union first. In fact, the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the CPC at the time decided that it could not reconcile with the U.S., and thus there was no alleged “lost chance” for the United States.

Keywords: “Leaning to One Side”; Theory of America’s “Lost Chance” in China;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ino-Soviet Alliance

【责任编辑 翁有为】

① 《关于周恩来去苏联参加谈判问题给中央的电报》（1950年1月2日、1月3日），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13页。

②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与毛泽东谈中国局势》（1949年4月13日），沈志华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9.3—1950.7）（二），第39页。

③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国军事政治形势》（1949年1月10日）、《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国局势和中共历史》（1949年1月30日），沈志华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一），第345、369页。